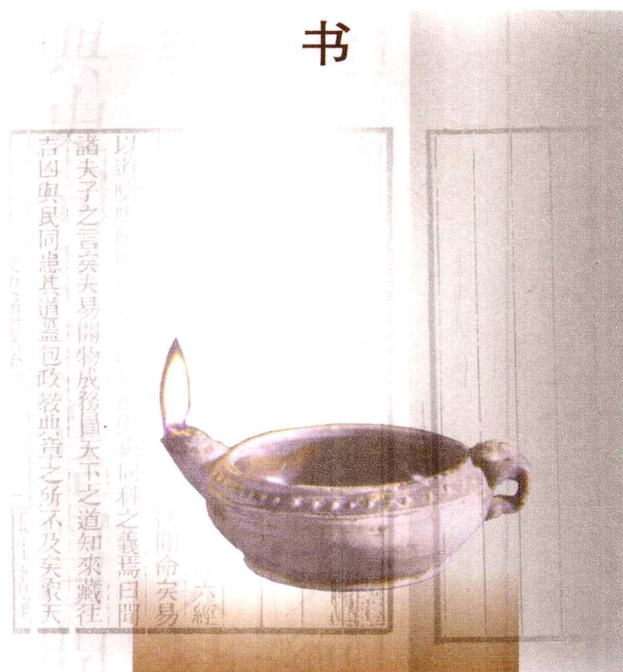


匡亚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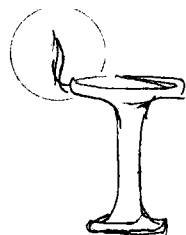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仓修良 叶建华 著

章学诚评传 (下)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章学诚评传 (下)

仓修良 叶建华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学诚评传/仓修良,叶建华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6047 - 2

I. 章… II. ①仓…②叶… III. 章学诚(1738 ~1801)-评传
IV. B249.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4183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章学诚评传

仓修良 叶建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32 字数 361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047 - 2

定价: 63.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孙家正

组 员 匡亚明 王霞林 蒋迪安

袁相碗 韩星臣 张永桃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时惠荣 张永桃 陈 振 茅家琦

林德宏 周勋初 蒋广学 潘富恩

第六章 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

章学诚一生中,因学问不合时好,自己又不愿“舍己以从时尚”,所以,政治上始终不得志,直到41岁才考取进士。中进士后,又“自以迂疏,不敢入仕”,政治活动固然未能参加,就是史馆之职也不曾取得。他在史学理论上虽有不少创见,却迫于生活,无法用自己那丰富的史学理论写出一部完整的史著。想改编《宋史》,也是美志不遂,花了多年心血经营的《史籍考》又未能刊行于世。而平生精力,除了论史、讲学外,多用于方志的编修和方志理论的讨论上。他把自己在史学方面的理论,在编修方志中加以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

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①又说自己“少长贫困,笔墨干人,屡膺志乘之聘,阅历志事多矣”^②。他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自己实践所得,参之以丰富的史学理论,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方志理论,从方志的起源演变到性质作用,从方志记载范围到编修体例,乃至志书资料的搜集考证、修志人员的素质修养等等,都作了论述,从而为中国古代方志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一、方志的起源和演变

我国的方志起源很早,章学诚从“志为史体”的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各地方诸侯国的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杻机》、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因此,在他看来,方志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这一认识,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并不妥当的,它混淆了史志的区别。我们从后来方志所具有的内容来看,它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内容的著作。这种亦地亦史的著作特点,实际上在西汉以来出现的“地记”中已经体现。这种“地记”,一般都是既载人物,又言风土。东汉后期,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豪族势力的成长,这种“地记”有了显著的发展,内容也比原来充

① 《文史通义》外篇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② 《文史通义》外篇四《州县请立志科议》。



实。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地方门阀豪族势力的扩大,为产生这类“地记”提供了社会基础,因而这一时期这种著作得到发展,各个重要地区都出现“风土记”、“风俗记”、“先贤传”,边远地区还有“异物志”。著名晋代史家习凿齿所撰的《襄阳耆旧记》便是这样一部代表作,其书“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复载其牧守”^①。不过,汉魏时期这类“地记”著作,完整流传至今的已没有,故对其体例和内容的探索较为困难。章学诚说:“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②又说:“至于郡县之志,则自东京以往,讫于六朝而还,若《陈留耆旧传》、《会稽先贤传》之类;其不为传名者,若《襄阳耆旧记》、《豫章志后撰》之类,载笔繁委,不可胜数。”^③学诚的这些论述无疑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魏晋以后,“地记”又逐渐为“图经”所取代。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用图表示这一地区的山川物产等,再配之以简要的文字说明,这就是“经”。后来,文字说明逐渐增多,最后取代图而成为主要内容。隋朝时这种图经已很普遍,虞世基、郎茂等人当时曾编成《隋诸州图经集》100卷,里面包含了当时各地的许多图经。唐代图经益趋普及和完善,如敦煌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都督府图经》两部图经残卷,可以看出当时图经的大致面貌。它们除了记载行政区划外,还叙述了该地的河流、堤堰、湖泊、驿道、古城、学校、歌谣等。五代到北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万有文库本。

② 《文史通义》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③ 《文史通义》外篇四《和州志列传总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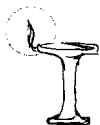
宋,这种著作仍称“图经”。章学诚曾对“图经”作过一番考述,在《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中他说:“古之图经,今不可见;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约略见于群书之所称引,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对于古代方志发展演变史上的这个“图经”阶段,章学诚重点在于辨明“图经”与正式方志的区别。他说:

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①

这里将成熟的方志体裁与方志发展史上的图经阶段截然分开论述,是不确切的,尤其是否认图经是方志,更为不妥。

到了南宋,图经改称为方志。如《严州图经》在南宋绍兴年间的刻本就改称《新定志》。这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方志,如《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等都是成于南宋时期。元明之后,地方志趋于稳定发展,特别是出现了大批一统志以及府州县志。由于全国性区域志的编纂,对各地方志的

① 《文史通义》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编修影响很大,元人修《元大一统志》,同时又肇创镇志。明朝纂有《大明一统志》,两省有总志,一省有通志,府、州、县都各自修志,江南许多地方还编修乡镇志。从此以后,方志的种类和形式基本上趋于定型成熟。清朝的《一统志》,经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纂修,每次纂修之前都诏令全国各地修志。雍正时期,命令各省府州县志要60年一修。这促使地方志得到更大的发展。清代各级地方行政单位都普遍修志,省有通志,府有府志,直隶州、直隶厅则有州志、厅志,县、市、镇亦都有志。此外有山志、水志、寺庙志、古迹志等等。章学诚论述元明以后的府州县志说:

统志创于元明,其体本于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輿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①

又说:

古之方志,虽有著录,而传者无多,惟宋志尚存十余家,元明志之可称者亦十余家,虽与流俗不可同日而语,而求之古人义例,鲜能无憾。……惟统部与

① 《文史通义》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府州及所属州县,各自为志,古人所无其例,实始前明。……宋制以州领县,县不皆有志,而州志不上职方,故书名或取古郡,或题山水,未有直称某州志者,所以避图经官书名目,余尝谓方志不得以图经为例,此亦其一证也。^①

总的来说,宋元以后,尤其是清代,方志编修达到高潮,各种志书纷纷出现。但章学诚认为,这一时期的志书大多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丢却了“史氏家法”,不符合史家法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志成为“地理专门”,二是染上“文人习气”,而不通于“史氏宏裁”。他在《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中,对这两种弊病都作了分析批判,最后指出:

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这也可见,章学诚探求方志起源和演变的用意,乃在于说明方

① 《文史通义》外篇四《方志辨体》。



志起源于古代史学,故编修方志也不可须臾离开“史法”。

二、方志的性质和作用

章学诚在探明了方志的起源和演变后,进一步对方志的性质作了阐述,明确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

关于方志的性质,古代学者长期把它视为地理专书,目录学著作分类上,也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类,它在史学上的地位也不被重视。尽管宋人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已经提出“郡国有志,犹国之有史”的观点,但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足够重视。到了明代,这个说法开始流行起来,许多方志的序、跋、凡例中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这个观点,不过仍然比较零碎,并未系统地从理论上加以阐述。直到清代章学诚,才从史学理论和方志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志属信史”的主张,辨明了方志在史学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同时批判了历代学者将方志视作地理专书的看法。

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①，“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后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驯,难垂典则故也”^②。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说:“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梣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③因此,它既不属于地理类,又有别于隋唐

① 《文史通义》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② 《文史通义》外篇五《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③ 《文史通义》外篇四。



以来的图经,而是“国史羽翼”,其价值亦应与国史性质相同。对这一问题,他曾反复进行论述,说明方志与国史性质相同。他在《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里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又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①可见,在章学诚看来,府州县志,也都是史,它与国史相较,“其义一也”。所不同者,不过一记全国之事,一述地方之言,只有范围广狭之殊,并无内容本质之异。既然如此,方志的内容和体裁,就都必须绳之以史法,而不能当作单纯的地理著作,仅限于地理沿革的考证。可是,长期以来,学者大多把方志看作是“地理专书”。对此,章学诚深为不满。他说:

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所疵议!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绩,仍是地理专门见解。……故方志而为纂类,初非所忌,正忌纂类而以地理专门自画;不知方志之为史裁,又不知纂类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②

① 《文史通义》外篇四。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



章学诚的这个看法,在当时的学术界,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大学者戴震即坚持认为方志属地理书类,主张“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①。对此说法,章学诚曾针锋相对进行了反驳。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章学诚既然认为方志是史,所以他把方志论文作为自己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放入《文史通义》之中。而《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它是“文”、“史”通义,综合讨论文史理论问题,他把方志文章列入其中,意味着什么,自然无需多说。事实也确是如此,他为每部方志所作的各类序例,实际上已成为研究他的史学理论的重要资料。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他把撰史和修志看作是一回事。总之,章学诚从多方面论述,反复说明“志乃史体”,“方志为国史要删”^②。

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当然它的作用也就无异于“国史”。因此它的首要任务就要具有“经世”之史的作用,能够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贡献。他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懔懔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③简而言之,亦就是垂鉴、惩劝和教育。当然,章氏所谓教育,就是要利用方志来对广大人民灌输封建的忠孝节义思想,目的在于扶持封建纲常,撑柱封建世教,以建立起良好的封建统治秩序。其次,方志还负有为朝廷修国史提供资

① 《文史通义》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② 《文史通义》外篇四《复崔荆州书》。

③ 《文史通义》外篇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料的任务。《方志立三书议》云：“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材，方将如《春秋》借资于百国宝书也。”《州县请立志科议》又说：“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朝史之要删也。”这两大作用，确实也都是从史的角度提出。既然如此，它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是地理专门所能代替。

然而以前方志并没有很好地起到上述作用，章学诚认为其中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则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修志诸家未能辨清方志的性质，误仿唐宋州郡图经，把方志当作地理之书。其二，方志变成了文人游戏、应酬文字或私家墓志寿文的汇集。《方志立三书议》云：

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搢绅先生每难言之，国史不得已，而下取于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求诸野也。然而私门撰著，恐有失实，无方志以为之持证，故不胜其考核之劳，且误信之弊，正恐不免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其三，修志者并无真才实学，而且多旨在追名逐利，舞弊曲笔，



成为风气。《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云：“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征实。”“今之所谓修志，令长徒务空名，作者又鲜学识，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竞，文士得之以舞曲笔；主宾各挟成见，同局或起抵牾，则其于修志事，虽不为亦可也。”这样一来，方志当然起不到“善恶惩创”的作用，也无从为编修国史提供资料。

关于修志的断限问题，也是长期争论不休而得不到解决的悬案。当时有人提出，“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也就是说，每部方志都必须从古修起。章学诚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所以不必每部都从古修起，而要从实际出发，“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①。这一观点，是章学诚非常强调的，他主张修志者必须保留前人已成之书，而不宜加以毁灭。《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云：“修志者，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彼此得失，观者自有公论。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以备遗亡，庶得大公无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见毁于后人矣。”可是，当时的修志者却完全相反，“近日之习套相沿，轻隳小生，史字未曾全识，皆可奋笔妄修，窃叨饫脯者。然其书百无一存。此皆后凌前替，修新志者，袭旧志之纪载，而灭作者之姓名。充其义类，将班《书》既出，《史记》即付祖龙；欧、宋成书，《旧唐》遂

① 《文史通义》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可覆瓮与”？这里不仅揭露当时修志中的严重弊病，而且也揭示出历来方志所以会很快散失乃至消亡的重要原因。章学诚还指出，修志是为了切合实用，也必须注明修当代之书，记当代之事，反映当代社会之现实。从这个精神出发，他认为“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他还举例说明：“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①他在晚年修《湖北通志》时，还一再强调这个精神，说：“方志诸家，例宜详近略远，古人见于史传，不藉方志表扬。假如《楚国世家》、《屈原列传》、陆贾儒术、季布高风，载之班马之书，今日岂能损益？摘录则嫌如类纂，全篇有似于传抄，书欲成家，良难位置。今于古人昭史传者，列表以著其出处，去传以见其无疑。则志例既得，简明无所窒累。苟有欲览其全，则文征于焉备矣。”^②这种修志不求观美，但求实用以及详近略远的主张，正是他“经世致用”史学思想在修志问题上的具体表现。这种思想能在乾嘉时代出现，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而他的“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的主张，深得阮元等的支持，故阮元在《重修仪征志序》中曾反复加以说明，可见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当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总之，章学诚关于方志起源与性质的探讨论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时许多人仍旧强调方志属地理专书，因而章氏所论是有针对性的，不能认为是“迂阔之谈”。他的目的在于矫枉，反对把方志看成是地理著作，同时又是为了提高方志的地位，强调方志的作用和价值。当然，根据

① 《文史通义》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② 《遗书》卷二七《湖北通志检存稿》四《文征甲集袁录正史列传论》。



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地理派”也好,“历史文献派”也好,都是对方志的一种片面认识。方志,确实曾经具有过“亦地亦史”的性质,而封建时代的目录学家在分类上又多将它列在地理类,但从它的内容和作用来说,决不从属于地理;方志的起源,确实又与史学密不可分,并是史学发展所产生的一个支流,但它又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从内容到形式,从编纂体例到文字叙述,都有显著不同。方志,实际上是介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它是记载某一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开始是由地方性的地理与地方性的人物传记汇合发展而成,最初就叫“地记”。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经演变,至南宋而基本定型,但其记载内容一直在不断丰富,体例也逐步完善,形成自成一体的著作形式。方志学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我们今天不能再坚持章学诚“志属史体”的老观点了,也不应当再用章学诚的地方志就是地方史的观点来指导今天新方志的编修。章学诚当时提出志就是史的观点,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因此对它的片面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来说,这个观点无疑是已经过时了,若再史志不分,片面去强调,对今天修志来说,势必带来不良的影响。当然也更不能将方志视作地理书。因为事实证明,地方志并不等于地方史,也不同于历史地理。它已经自成体系,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自己的特点,既不能用地方史的尺度来要求它,也不能用历史地理的标准来衡量它,否则编写出来的就不可能是地方志了^①。

① 有关这方面内容,可参阅仓修良著《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11月版。

